

内容 19 03 总第 100 卷第 1 期

出版说明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 300070
电话：(022) 2333 2211

中国传统文化

主 编 马怀立 姜良威 张 毅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文化”的定义很多，见仁见智，众说歧出。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个词已经提出了两百多个定义，真可谓“滔滔者天下尽是也”。

我们这里就取《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特指”一语前是指广义上的“文化”概念，“特指”一语后是狭义上的“文化”概念。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呢？如果要与上面《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一词的解释取得逻辑上的一致，那么，广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如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词组，起码具有以下三层含义：第一，它是中国文化，这是从地域、国别、民族三个方面对某一文化所进行的界定；第二，它是传统文化，这不仅是在历史的时间性上对某种文化进行界定，而且是对某种文化内容、文化特质本身进行限定；第三，这个词组隐含着不言而喻的对立面——西方文化。我们认为，对“传统”这个词的理解，主要不是从时间性上来领会的，而是从中国文化中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的那些文化内容本身和文化特质来领会的。说得直白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中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与“西方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对比性的那部分文化。这些文化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之前，是已经存在的，但当时作为没有特定对立面的文化，它的自足自律性使它根本不具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词的特殊含义。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传统文化在存在的时间上先于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就取消了“西方文化”这个对立面或历史背景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词的含义。

如今，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内容至广博、精神至深邃的课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尤其是当代广大读者。在不少人心目中，似乎还产生了一种认同传统文化、回归传统文化的想法。人们似乎预感到，作为一个巨大的思想或精神资源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中国这块土地上，将越来越呈现出它自身的魅力和价值。尤其是对广大读者来说，他们希望尽快地步出疏远、陌生、好奇的境况，走近中国传统文化，在了解、批判、认同等过程中，将传统文化这种可能的精神资源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精

神资源。我们认为，这种想法出现在21世纪的今天，并不是没有历史缘由和现实根据的。

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起码经历了三次冲击。

第一次是20年代前后的“五四”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民主及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吴虞提出“只手打倒孔家店”。胡适之、陈独秀、鲁迅等人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也不仅仅是文字和文学层面上的问题。它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清算。“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们更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消极一面，而以章士钊、吴宓等为代表的“甲寅”“学衡”等人物更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中可资取用的一面，但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在当时是何其低微啊，可谓应者寥寥。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传统”著称于后人的。

第二次冲击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以“破四旧”等运动疯狂销毁古书古文物始，又以带着政治目的地抬高法家、贬抑儒家。“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先进的外来文化（如科学、民主、西方人文精神）之劫，亦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之厄。士、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播、传承和创造的最主要的群体。当士、知识分子的地位被排到了“臭老九”的位置上时，这个社会在优秀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创造上，怎么可能会有出色的建树呢？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传统文化中负面的东西的沉渣泛起，更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次浩劫。

第三次冲击则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传统工农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的时候，传统文化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往往会受到相应的怀疑和忽视。这种怀疑和忽视一方面来自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整套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同以农业、手工业为经济基础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巨大的隔阂；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以英语语境为主流的西方文化的排挤。具体说来，当传统的“人治”社会日益走向法制社会的时候，当金融、股市、工商管理 etc 日益走向国际化的时候，当教育内容中英语教学、考试所占的比重日益加大的时候，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和忽视似乎成了一种无可厚非的事实了。

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否定者，就必有肯定者。有主导者，就必有非主导者。自从20世纪20年代章士钊、吴宓等人相对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诸贤，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传统文化之后，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到五六十年代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从杜维明、余英时等为代表的“海外新儒家”，到80年代中后期内地出现对新儒家研究的加

温……那些对传统文化带着积极的建设性想法的人们，一直都没有停止他们执著的声音。特别是1958年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四人共同署名的那份长达4万字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简直颇有一些堂吉珂德与风车作战的意味。然而，检讨整个20世纪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成败得失，然后再去听听诸如“新儒家”们所发出的声音，人们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包含的许多真知灼见了。比如以“天人合一”的观念对治人定胜天、征服自然以致最后为自然所惩罚的人类之境况；比如以传统文化中“大一统”的观念反对国家分裂主义；比如以重义轻利或义利并重的伦理原则对治世风日下的功利主义及利己主义；比如从建设性的态度出发，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念，等等。

在整整一个世纪一次次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否定、批判甚至漠视的思潮和现状之中，总不乏愿意逆时风而动，以传承传统文化的薪火为己任，为传统文化鼓与呼的人士。也正是在这些执着的鼓与呼中所包含的许多真知灼见，叩开了人们的理智之扉，引发了人们思考的热情和对传统文化重新认识、检讨的需要。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缘由和现实根据。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至广博、至深邃，不是任何个人或团体、机构所能备述其详的。实际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评述、检讨、批判，无不局限于一个相对狭窄的领域之内。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大而不当、广博得不得了的鸿篇巨制，其所涉及的也仅仅是整个传统文化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其成也毁也。讲到的少，讲不到的多，毁甚于成，但这并未遏制或削减人们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

编写本书，正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热切希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欲求。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编者

2018年5月

目录

出版说明	1
项目一 传统思想与礼仪风俗	1
项目概述	1
项目要点	1
任务一 倡导和谐的传统思想	2
任务二 “礼仪之邦”与传统礼节	15
项目小结	25
项目拓展思考	26
项目二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	27
项目概述	27
项目要点	27
任务一 中国古代的主体意识形态——儒道释“三教合一”	28
任务二 早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及“亚圣”孟子	29
任务三 儒家的经书与经学	36
任务四 先秦时期道家的两位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	38
任务五 法家思想与墨家思想	47
项目小结	50
项目拓展思考	51
项目三 中国传统物质文化	52
项目概述	52
项目要点	52
任务一 饮食文化	53
任务二 服饰文化	73
任务三 建筑文化	85
项目小结	97

目录

项目拓展思考	98
项目四 中国传统节日及风俗	99
项目概述	99
项目要点	99
任务一 中国传统节日的由来和文化内涵	100
任务二 中国汉族主要传统节日和文化	102
任务三 中国少数民族主要传统节日和文化	116
项目小结	131
项目拓展思考	131
项目五 中国传统艺术	132
项目概述	132
项目要点	132
任务一 中国古代音乐艺术	133
任务二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	144
任务三 中国古代书法艺术	153
任务四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	159
项目小结	165
项目拓展思考	166
参考文献	167

项目一

传统思想与礼仪风俗



项目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创造出的这些文化，不管在什么时代和社会背景下，都能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或代表社会的潮流，或体现人们的意愿，抑或反映社会生活的不同风貌。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扬善抑恶的功能，有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思想和风俗为代表的精神文化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貌。正是这些思想和风俗，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平、安定生活环境的渴望，对和谐、稳定社会秩序的企盼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进而推动着社会的文明进程。



项目要点

1. 倡导和谐的传统思想
2. “礼仪之邦”与传统礼节

任务一 倡导和谐的传统思想



中国的传统文化，植根于本土的自然经济基础。据考古资料证明，远在距今约八千年前，伴随着磨制技术应用于生产工具的制作，原始种植业开始出现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大地上。我国由此进入农耕文明的历史，农业经济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国也由此成为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文明古国。

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为了不误农时，必须营造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保证农业生产的首要条件。

农业生产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劳作。因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直接关系着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四季的变化和光照、降水、气流等气象要素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

在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传统文化，与农业生产有着必然的联系。基于农业生产的这些特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就围绕着社会、人、自然三个主题展开，旨在通过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的思想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由于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为了减少自然因素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人们必须与自然抗争。但与自然抗争，仅靠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还需要众人的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所以社会形成了很强的团结意识。同时，和谐、稳定的社会人际关系与团结之间又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只有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友善、和睦、共存的关系，才能维系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的稳定。这种由农业生产形成的社会共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一、孔子的“礼”与“仁”

在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社会生活、生产秩序，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始终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阐述对稳定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增进相互情感等问题的认识 and 主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由孔子（见图1-1）创立的儒家思想。

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从自己的立场和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



图1-1 孔子像

益出发，阐述对社会变革的认识和见解，由此产生“诸子百家”，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在“诸子百家”的观点中，或主张法治，或主张“顺其自然”，或主张攻战，或主张小国寡民、封闭自保，或主张节俭，等等。凡此种种，都试图摆脱因社会变革造成的困境，以求尽快恢复稳定的社会秩序。孔子倡导的“礼治”，则更多的是从人际关系出发，以求构建一种和睦、友善的社会秩序。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和“仁”。

孔子涉及“礼”的言论很多，其中既有对“礼”的基本定义的阐释，又有对“礼”的功能和作用的论述。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蕙，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

孔子关于“礼”的论述还有许多，但仅从以上摘录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中就不难看出，孔子所倡导的“礼”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所谓的“礼之用，和为贵”，就鲜明地点出了“礼”的本质和功能，即讲礼、学礼、行礼、尊礼、守礼，都是出于“和”的需要，也就是用“礼”来协调人际关系，使人與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和睦、和谐、和善、和亲的关系。可见，孔子所说的“礼”，实际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各种日常行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标准。

在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许多言论中，还谈到“仁”。孔子所说的“仁”，所涉及的范围也是很广的。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处长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论语·里仁》)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

从以上列举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与“礼”相比，对“仁”的论述更多的是从人们日常的生活入手，涉及人的言谈举止。也就是说，“仁”侧重于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主要是指为人处世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

综合孔子对“礼”和“仁”的论述，不难看出，在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背景下，他极力倡导“礼”和“仁”，就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以此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

孔子不仅积极倡导“礼”，还将“礼”运用于实践。孔子创办私学后，就按照《周礼》的规定，将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谓的“六艺”，作为生徒学习的内

容。“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此后，这也成为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

孔子将“礼”作为教育的内容，是因为他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殁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礼记·礼运》）“礼”不仅可以治国，更能安邦。“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俟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礼记·礼运》）孔子认为，“礼”是国君治国安邦的一件法宝，用它可以明辨是非、洞察细微的过失，还可以接待鬼神、孝敬祖先、考订法令规程、区别贤明忠诚。通过“礼”的这些作用，就能治理国家的政务，巩固国君的统治地位。所以，当国家的治理出现偏差时，国君的统治地位就会出现危机，大臣们就会因此无视君命，甚至抗命反叛。尽管有严厉的刑罚可以制裁他们，然而他们仍可以钻刑罚的空隙，继续为非作歹，从而导致贪婪、无耻的风气蔓延，导致国家法令杂乱无章。这种混乱的局面，又会造成礼仪沦丧、社会秩序混乱。在严刑峻法和社会风气败坏的影响下，民心必定涣散。从孔子的这番言论中不难看出，尽管一个国家有严格的法律，但如果没有“礼”的配合，社会风气不会良好，国家也很难实现长治久安。

在学校中设置“礼”的课程，就是要使学生学习有关“礼”的知识，了解各种“礼”的作用和内涵，学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对象，按照与“礼”配套的仪式，恰当地掌握行“礼”的方式和礼节举止。为此，在中国古代的学校中，还设置有专门供学生进行习礼、讲礼、行礼等活动的场所，即“礼堂”。

自孔子将“礼”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后，历朝历代均将“礼”作为国家的“重典”，用以规范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当然，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孔子倡导的“礼”不可避免地带有等级制度的烙印，旨在维护和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但当孔子创办私学后，知识下移，又使得“礼”及相关的礼仪制度从社会上层下移到社会下层，为广民众所接受和遵行。正是由于“礼”有助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所以在以后的历史中，“礼”便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古代中国也因此被世界誉为“礼仪之邦”。

“仁”作为道德标准，是社会各阶层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在以后的历史中，“仁”的范畴和内容也在不断地扩大和增加。

孔子之所以倡导“仁”，是希望人们能体现善良的本质，能善待他人、待人以

诚。这种“仁”的思想，在战国时期，经孟子（见图1-2）的发展，又成为“仁政”。“孟子曰：‘二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孟子将“仁”与治国安邦相联系，目的是希望统治者能善待民众，避免因暴政引发对立和反抗，以此稳定社会秩序。



图1-2 孟子像

同样，孟子所倡导的“仁政”也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也要看到，如果在统治者身上及其统治政策中能体现人的善良本性，就也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如果统治者自身能施以“仁政”，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孔子就曾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孟子的“仁政”，实际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拓展。他对“仁政”的评判标准，则更多地体现了他主张的“人善论”，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和“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

由此可见，孟子的“仁”更加侧重于彰显人性的本质，希望以此构筑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此后，“礼”与“仁”一直为后代儒学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重礼、行礼、讲礼成为社会时尚；由重仁、施仁，延伸至爱人，也因此成为社会风尚。正是这些传统道德标准提升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程度，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传统的“诚信为本”思想

“礼”和“仁”，作为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虽然规范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日常行为，但要使大家都能自觉遵守“礼”，真正体现“仁”的本质，还需要每个人都能恪守“诚信”。因为只有“诚信”才能消除人们相互之间的猜忌和疑虑，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构筑稳定的社会。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诚信为本”也是极其重要的内容。

孔子认为“信”是为政治国、为人处世的基点。无“信”不足以为政，不能治国，同样也不能做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不过，孔子对“信”的论述，主要是从“忠”的角度分析的。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輓，小车无軌，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

“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

“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孔子所说的“忠信”，实际也就是“诚信”。孔子的“忠信”观，很清楚地表明人与人交往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判定人际交往中行为表现的原则和标准。如“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诚信”必须符合“义”的要求和实际情况。例如，讲信用，不要说大话，做不到的就不要答应别人。《大学》中对此有十分明确且浅显的解释：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更为重要的是，孔子认为“忠信”应该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做起。“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硃硃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子路》）在此，孔子将忠君、孝敬与守信相提并论，认为这是有身份的文人，即“士”，应恪守的三项为人的标准。其中的“言必信，行必果”，则是将言、行这些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事情纳入讲诚、守信的范畴。如果人与人在日常交往中，能恪守“诚信”的原则和标准，那么就能相互信任、以诚相待，这无疑会更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孟子在孔子论述“诚信”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诚信”的思想。孟子认为：“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在此，孟子将“诚”视为“天之道”，“思诚”则视为“人之道”。孟子主张通过“反身”，即反思等方法，检点自己内心的“诚”，以使自己真正达到“诚”的精神境界。在判定诚信的标准上，孟子还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有德的君子之所以不必句句话都严格信守，做事亦不必件件考虑结果，是因为他们的言行都以“义”作为准则。

将“义”与“诚信”相联系，实际是将“诚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孔子认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中国古代所说的“义”，具有正直、公正、正气之意。在孟子看来，正直、公正是“诚信”的基础，即“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将“义”作为评判言行的标准，也是力求使人们的言语和行为举止符合社会公共道德，因此具有弘扬正义的功能。

孟子也将“善”融入“诚信”之中，强调“善”与“诚信”是一个统一体。“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这实际也是孟子关于“人性善”的理论在“诚信”问题上的体现，也就是说“诚信”是“人性善”的具体表现。

孟子对“诚信”的这种认识，在儒家的其他经典著作中也有反映。如“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

措之宜也”（《礼记·中庸》）。这些论述，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诚信”的本源，阐述“诚信”对彰显人性之善的作用。

以后的儒家代表人物，又继续对“诚信”问题进行论述和探讨，以增强社会对“诚信”的重视，净化社会风气。如荀子在《不苟》篇中就提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的观点。他认为，“诚”是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诚”又需要以“仁”“义”为基础，是“仁”“义”在人们言行中的具体体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荀子·不苟》）可见“诚信”不仅可以构建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和谐、友善关系，还有助于改正人的恶习，使人知理从善、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在《非十二子》篇中，他还认为：“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也就是说，人应该以自己的品德不高尚、不讲信用为耻辱，而不能因别人污蔑自己、未被人信任而感到耻辱，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由此可见，古人之所以重视“诚信”，就在于“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维系社会安定、和谐的根基。

西汉时期，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又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他认为：“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尽管董仲舒将“信”与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是出于“独尊儒术”的需要，但经过他的极力主张和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五常”成为全社会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集儒家之大成的朱熹对“诚”提出了一个判定的标准。“诚字在道，则为实有之理；在人，则为实然之心。”（《朱子文集·答曾致虚》）也就是说“诚”用于社会生活，是最普遍、质朴的道理；用于与人交往，则体现为实在、真挚的情感，在与人际交往时，不能夹杂任何个人的私欲。“诚”是人应恪守的道德标准，“信”则是人应恪守的行为准则，即“诚实守信”。故“诚”与“信”在古代被奉为立人之本、为人之道，合称为“诚信”。

在以后的历史中，“讲诚”“守信”更是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逐渐渗透到中华民族道德意识的深层，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涌现出的诸多仁人志士，也都是讲信用、守信用的楷模。

中国古代的商业也恪守“诚信为本”的宗旨。“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是商家

的经营理念。如在宋代画家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商家店铺打出体现“诚信”的招牌——在一家肉铺的门脸上方，悬挂着一块招牌，上书“斤六十足”，既明码标价，又昭示足斤足两、严守信誉（见图1-3）。

创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的同仁堂，是举世闻名的中华老字号。在其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同仁堂始终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传统店训，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作为自律的原则，从而确保了同仁堂的金字招牌享誉全球，长盛不衰。



图1-3 《清明上河图》中的肉铺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儒商，就是以恪守“诚信”之道著称。他们倡导在经商活动中，需要遵守八大原则，即“无诚无物”“真实无妄”“诚善相依”“至诚无息”“诚则动人”“成己成物”“反身而诚”“诚明相资”。从这八大原则中可以看出，“诚信”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的经商之道，对商业的发展和兴盛具有积极的作用。

儒家的“诚信”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权建设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商鞅变法时的“立木为信”。中国历代的法制中还有对违反“诚信”的行为进行惩罚的规定，如视“欺君”为重罪，并规定有“诈骗”“诬告”等罪行。此外，儒家“诚信”思想也对君主的言行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如“君无戏言”，即要求帝王必须言而有信。

“诚信”在中国古代被视为立人、做人之本，所以古人从小便在家庭内受到“诚信”的教育。南北朝时期北齐的著名学者颜之推以儒家传统思想为立身、治家之道，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他撰写出一部家训，即《颜氏家训》。其中，“诚信”便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终如始者，方可议之。”（《颜氏家训·风操》）也就是说，要与他人交往密切，必须志同道合，始终如一。要做到这点，“诚信”是至关重要的。

“吾见世人，清名登而金贝人，信誉显而然诺亏，不知后之矛戟，毁前之干櫓也。虞子贱云：‘诚手此者形于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颜氏家训·名实》）在此，颜之推告诫子孙后代，他见过的世上的人，有名声显赫但敛财不计者，有信誉卓著却失信于人者，如同后面的矛戟戳穿前面的盾牌。孔子的弟子虞子贱曾说：“做这件事诚信，就为做其他事情立了榜样。”一个人的虚实、真伪，源于其内心，没有不在其行动上

表现出来的。感受不到是因为观察尚不深入、仔细。一旦别人仔细观察，那种乔装打扮、精心作伪者，就不如拙而诚实者，必会招致奇耻大辱。

颜之推还要求子孙后代要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恪守“诚信”的做人原则。“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颜氏家训·治家》）借人家的书籍，要特别爱护。对原来就有的缺失损坏卷页，应该修补。有些人对他人的书籍不爱护，致使损坏，虽不是他直接所为，但也是有损道德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失信的行为。正因为颜氏家庭将“诚信”作为家训的内容，教育后代恪守“诚信”的做人准则，所以才能够培养出为官清正廉洁、被后人誉为“道德君子”的颜真卿。

宋代学者袁采的《袁氏世范》，也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家训。袁采在这部家训中，特别强调子孙后代要恪守“诚信”。“言忠信，行笃敬，乃圣人教人取重于乡曲之术。盖财物交加，不损人而益己，患难之际，不妨人而利己，所谓忠也。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处事近厚，处心诚实，所谓笃也。”（《袁氏世范·处己·人贵忠信笃敬》）

“‘忠信’二字，君子不守者少，小人不守者多。且如小人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湿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词，止于求售，误人食用，有不恤也。其不忠也类如此。”（《袁氏世范·处己·小人难责以忠信》）袁氏的家训，将损人利己、坑蒙拐骗等视为不讲“诚信”的行为，告诫后代做人必须“诚信”为先。

明末清初学者朱用纯在其为子孙后代留下的《朱子家训》中，告诫道：“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他不仅要求子孙不能见利忘义，更将嫌贫媚富视为不道德，亦是“诚信”缺失的表现。

在中国古代，不仅在家教中注重对子女的“诚信”教育，学校教育中也很注重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在古代的一些供少儿学习的启蒙教材和读物中，就有“诚信”教育的内容。如清初教育家李毓秀编写的《弟子规》中曾讲到，“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人借物，有勿悭。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将“诚信”教育编入启蒙教材中，旨在从小培养子女懂得“诚信”，养成恪守“诚信”的良好品德。